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毛泽东的思想 典藏本

[美] 斯图尔特·R·施拉姆 著

Stuart R. Schra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田松年 杨 德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的思想: 典藏本/ (美) 施拉姆著; 田松年, 杨德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 萧延中主编)

ISBN 978-7-300-17633-8

I. ①毛… II. ①施…②田…③杨…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926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的思想

典藏本

[美] 斯图尔特·R·施拉姆 著

田松年 杨德等译

Mao Zedong de Si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3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1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颇富个性的诗人。鉴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鉴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之“现代性”和比较政治学的宏观视角上，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毛泽东研究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这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首先旨在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同时也期望为人们进一步审视和反思 20 世纪人类的“现代性”过程，提供一个侧面的资料支持。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合作的科研出版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诸位专家，为本译丛的持续和拓展做出了大量建设性的贡献。秉承学术研究的基础准则，我们注意精选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影响，持论公允、论说严谨的研究著述。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论证的学术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作者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专家，他们慷慨允诺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是促成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盛事的基础要素。国内各位权威专家慨然允诺担任译丛的顾问，是对我们译介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审读专家们对选题和译文所提出的多方面的修改意见，也是译丛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译丛翻译出版的专家、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敬意和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均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核校；凡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以及特定条件的局限所带来的问题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编委会

2013年8月

译者序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是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家。他1924年出生于美国，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1968—197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90年退休返回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等。现由他主编的10卷本英文版毛泽东文集《通向权力之路》的第1~5卷已于1992年以后陆续出版，6、7两卷也将于近期付梓，最后3卷也已翻译完毕，等待出版。这是由施拉姆主持、许多西方学者精心编辑和翻译的学术杰作。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杰出贡献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再认识毛泽东”，可见他在西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期，施拉姆的主要研究著述就陆续被译成中文，并与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他的名字也广为中国一般学者所熟知。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施拉姆在从事毛泽东研究之前，曾经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参加过著名的“曼哈顿计

划”的工作。同时，施拉姆精通多种外语，在法国政治和俄国政治等研究领域也有所建树。

这部《毛泽东的思想》是施拉姆迄今为止最后的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他本人认为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成熟之作，198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施拉姆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性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施拉姆的书名为“毛泽东的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而不是“毛泽东思想”（The Mao Tse-tung Thought）。这就表明他的研究是以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为基础的，而与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在概念内涵上有所不同。同时，他也没有使用西方学者常使用的“毛主义”（Maoism）概念，这也暗示了施拉姆试图尽可能地淡化此项研究之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倾向。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一般”、“最持久”的贡献是他的思想，他对中国革命最杰出的贡献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同时，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它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不断变动的一种反映”。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中，“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变化过程的各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中毛泽东的思想的实质以及这些思想的深远意义，它们对政治和社会变化与变革的作用”乃是应该着力研究的方向。而在思想史意义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诸多贡献之中，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之中，运用到中国的历史遗产之中，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这既是毛泽东理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是把握其思想的主要线索。随着革命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实施过程分为各个不同阶段，就基本原则和整体而言，毛泽东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存在着断裂和矛盾。这种转折主要表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片面夸大上层建筑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倾向，片面夸大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倾向，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中逐渐发展起来，使他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

施拉姆接着强调，虽然毛泽东晚年某种思想倾向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观念之中，但他并不赞同把“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说成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高阶段或顶峰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导致这些失误的观点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矛盾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在许多方面否定了自己正确的东西才造成了这些失误。因此，尽管这些失误证明了毛泽东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已经过时。施拉姆教授在结束语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观点虽然与毛泽东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丝毫未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努力保持中国的特色。在施拉姆看来，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之精髓所在。

二、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历史分期

在总体上，施拉姆以1949年为分界线，将毛泽东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这与国内学术界及海外其他学者的一般划分基本相同，但当涉及更为具体的阶段性分期时，《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则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施拉姆认为，总体而言，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上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急剧的变化。以此为据，他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

1917—1927年：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学

习”。这种“学习”直接规定了毛泽东早期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知识积累和社会参与两项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中心论。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施拉姆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性格形成时期”。

1927—1936年：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开端，表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时起直至遵义会议，他获得最高领导权，这是权力斗争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逐渐形成，“群众路线”的观点开始形成。施拉姆认为这是毛泽东“锻造武器的时期”。

1936—1947年：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不仅写完了1949年以前的全部著作，而且随着《西行漫记》一书的出版一举登上了国际舞台。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1941—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积极推广他的这一思想。这样既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提高了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1943年3月，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最高统帅。从1945年4月“七大”开始，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南。因而，施拉姆认为这是毛泽东明确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

1947—1957年：1947—1949年毛泽东在指挥具有决定性的国内战争的同时，开始考虑夺取政权以后所面临的任务。起初，他强调必须参照列宁和苏联的模式，把城市和重工业的建设提到首位。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渐进和稳健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农村，他主张保留富农经济，1955年以后，他的政策突然变得激进。这是一个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过渡时期。

1957—1966年：“反右”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即发动1958—1960年的“大跃进”，当“大跃进”的结果出现混乱时他隐退了。但他绝对反对抛弃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大跃进”，这种情绪促使他在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准备对“走资派”进行反击。施拉姆称这是“不可思议的‘大跃进’时期”。

1966—1976年：毛泽东的思想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毛泽东在这十年开始的时候，用激进的方式调动群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其次是所有他认为思想上倒退、行动上腐败的官僚主义阶层。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中国所面临的困惑与受到的挫折与日俱增，因此毛泽东越来越渴望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这时他仍处于统帅地位，但他却已经没有力量做这件事了。

总之，在施拉姆的视野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他十分重视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具有约束力；在晚年，他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教条。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他始终试图用过去的知识指导现实和将来。

施拉姆上述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崭新、大胆和富于创造性。仔细体味，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每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都作了相应的概括、分析和规定，这在思想上是清晰的。同时，这种划分是作者多年来反复研究的成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事出有因，源于史实。例如，作者以1936年为历史断限，就具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足够依据。再如，施拉姆没有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划分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依据，似乎不近情理。但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确实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曾说过，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他高兴。他说，到了1955年，当他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他开始高兴了。而且，这种从1947—1957年的划分方法，充分考虑了历史惯性的持续影响，因为从战争状态转为和平状态要有一个过程。相应的，理论内涵的变动也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一种模式转变到另一种模式。因而，施拉姆的这个划分是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

三、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方法

施拉姆的研究特色，不是从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去透视和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换言之，他并未从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角度研究思想，而是通过对各种历史要素的客观展现，着力分析人物、思潮和事件的过程、实质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思想”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正如他在该书“导论”中所说：“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思想观念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统化之后，就要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应用”。这就是说，“历史”与“意志”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思想的发展。“思想”在历史条件的规定下形成，却又有目的地不断实现着，因而思想史就成了主客观诸多因素交互影响的有机产物。依据这一方法论原则，《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力图摆脱那种从某种类似“绝对精神”的思维框架出发，尔后再提出若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原理”等口号式的研究方法，尽量避免情绪化的推崇和抨击以及形式主义的空泛议论，而是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置于客观的历史场景之中，通过细腻的考证和描述，把握毛泽东的思想逻辑之主要内涵和不断转换，最后作出富有特色的独到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思想》一书是一部更具有历史主义特色的思想史著作。

这样，施拉姆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考察，其基本问题就比较接近全面。这表现在：其一，不把毛泽东的思想看成是单线过程。作者在把握和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时，力求把它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趋向，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传统文化和外来理论、心理和性格等多个侧面进行分析。例如，作者对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的思想转折的描述就是这种分析方法的尝试。其二，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本身是由多种对立因素构成的辩证统一体，因此，在叙述毛泽东的某个思想时，他尽力揭示出相互制约的各个侧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些著作中常见的“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的片面倾向，使其分析比较接近于毛泽东的思想原貌。

同时，施拉姆非常注意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对事件作具体分析。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往往是针对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的，如果脱离具体的条件和背景作抽象的分析，就难免发生误解。施拉姆在本书中虽然没有以很多篇幅叙述这种条件和背景，但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是努力在具体的环境中理解毛泽东的观点的。其二，中国革命是个复杂曲折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不可能是个单向过程。即使在分析毛泽东出现重大失误时期的思想观点时，施拉姆也能比较注意不作简单化的结论，而是依据文献史料指出毛泽东的积极贡献以及为纠正自己的某些失误而作的努力。作为一位学者，施拉姆总是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和进一步的研究修正原来不准确的观点。例如，在《毛泽东》一书中，施拉姆教授曾认为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尚未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有关文字是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增补的。而在这本书中，他明确否定了把毛泽东视为“农民革命家”的观点，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证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信奉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又如，在《毛泽东》中施拉姆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农民反对工人、农村反对城市的运动。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对当年那场大动乱掌握了较多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本书中，施拉姆也放弃了这种不准确的看法。这类修正和补充还有多处。这都反映了施拉姆严谨的治学态度。

与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角色定位也是施拉姆所关注的一个方面。施拉姆概括说：“20世纪的重要人物几乎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在西方受到极不相同的各种评价：40年代，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许多方面，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真实性上值得怀疑的、天才的游击战领袖。50年代初，又认为他是一个服从莫斯科党国的中国领导人。其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人们，特别是西方造反学生的心目中，他又变成了一位高瞻远瞩、富有灵

性的圣人，认为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更激进和更人道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又觉得他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模型所铸造的一个政治‘天子’。毛泽东是同时兼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复杂天才。”但施拉姆把研究视角定位在毛泽东具有超凡的政治魅力与组织向心力的关系上。施拉姆认为，之所以说毛泽东“一生是中国许多方面的代表”，是由于以下方面的原因：他出身农民，知道中国社会的重心在农村；从父亲身上，他了解到了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他出生在中国的中部，这些地方不同于沿海城市，但这些地方并不是同外国的影响和政治的骚动完全隔离，湖南是近代许多新思想的发源地。另外，“毛泽东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他非常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毛泽东极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坚持要按照中国的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正外来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总之，农民的价值观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论和中国传统，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和充分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最近，施拉姆仍然认同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虽然在掌权之后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仍然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在2003年哈佛会议回答关于为什么不能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等人相提并论时，八十高龄的施拉姆明确地回答说：“从许多方面看，毛泽东的政治本能都是健全的。他力图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只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在个人的情感方面，过于感情用事、固执任性和狂热，从而铸下大错。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永远铭记他。”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将本书与《毛泽东》比较，施拉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向

前深化了一步。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施拉姆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是中国共产党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过程中提出的一种说法，尽管它不够准确，但其实质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否认，施拉姆在借用这一说法时也吸收了类似的思想，但是，他在这一命题中所强调的因素却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于是，他所理解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结合。当然，毛泽东一贯重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工作，并努力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的精华，但这毕竟不完全是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实质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差，使施拉姆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当成毛泽东的思想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并把二者的相互关系及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作为解释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依据，这当然难免得出失实的结论。他试图从道教“阴阳”辩证法中寻找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思想根源，从强调国家教化职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引申出毛泽东晚年夸大上层建筑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本书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若干史实的叙述和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分析也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中无不夹杂着作者的某种倾向。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史料扎实，但坦率地说，或许因为更加关注“本文的含义”，进而在“超越本文”进行意义分析时就略显单薄。例如，施拉姆在把握1927—1937年的毛泽东的思想时，富有创见地提炼出“党”、“群众”、“军队”三项核心的思想要素。本来，这实际上体现出毛泽东政治思维结构的重要内容，无论其早年思想，还是其晚年思想，这些要素的本质始终未变，只是形式上发生了若干转换。如果研究者的思路再开阔一些，那么完全可能“超越本文”，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挖掘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内涵。但纵观全书，我们感觉不到施拉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明显意

识，因而不能不为这潜在的思想火花未能继续闪亮而感到遗憾。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相信读者会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在此不一一赘述。

《毛泽东的思想》原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组织翻译，1990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十几位学者参加了这个版本的翻译工作，石仲泉和张宁负责全书的审定。决定将本书收入“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后，我们及时与施拉姆教授本人取得了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并希望他为新中文版撰写序言。施拉姆教授在病榻上通过秘书致函译丛主编，表示对新版《毛泽东的思想》即将公开出版表示赞许，希望对由于身体欠佳不能撰写序言给予理解。同时他指出，该版的英文书名“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应为“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对施拉姆教授抱病支持我们的工作和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新版《毛泽东的思想》，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余梦晖补译了书后索引，并对注释做了统一的重新校译。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4年10月于北京

序*

*本篇序及接下来的“导论”均写于1988年。——编者注

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为《剑桥中国史》第13卷撰写的论述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另一部分是我为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撰写的论述从1949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虽然我做了一些编辑方面的修改，但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要随意更动原文、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结果是，随之而来的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其观念的分析和评价。尽管一有可能我就尽力把这些观念同阐述它们的环境联系起来，但是，在原书的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其他各章已经论及的历史事实甚至是那些对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也是不合适的。

vii

专为本书撰写的导论和结束语就是意在弥补这种种省略，并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发展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导论首先讨论了毛泽东试图驾驭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变革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使他得以扮演其角色的种种因素。然后，导论考察了毛泽东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其思想的各个转折点之间的关系。至于结束语，其目的不在总结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主要原则，而是要对它在中国持续不衰的意义作出估价，并预测它今后在一个有些人声称正在发生“非毛化”过程的社会和制度中的位置。

我并不认为本书十全十美，要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作出确切的

2 毛泽东的思想

说明，它还有缺陷。但是，它的基础是我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做的研究工作。本书究竟是否把我所作的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要由别人来判定。无论如何，我多年从事毛泽东的思想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我已经欠下了很多人情，在这里向帮助我的人们致以谢意，对我来说是一项非常愉快的使命。

viii

履行这一使命，最好从头说起。在这个领域中，我最早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是翻译和分析毛泽东在1917年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这时，我受惠于埃丁纳·巴拉兹（Etienne Balazs）的鼓励和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承蒙特许参加他在巴黎举办的讲习班。此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度过了一年时光，它使我有机会萌生纵观毛泽东的思想的最初念头。

在从事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个人向我提供了帮助，详细情况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的致谢辞中已有说明。这些人中有三位最为突出。当时的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 Fairbank），以他独具特色的热诚与严谨并济的方式主持了研究活动。我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同窗一年的时间里，他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向我提供了思想上的激励。胡佛研究所东亚资料馆馆长欧根·吴（Eugene Wu）给我以便利，使我初次接触到延安时期的材料，从而帮助我打开了依据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著述文稿研究其思想历程的大门。

1962年夏，当我在胡佛图书馆阅读《解放日报》时，我还不能想象，尔后我竟能结识该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于光远、李锐、廖盖隆和温济泽。这一事实是此后发生的世界政治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变化的象征。到1963年，在资料方面和极有价值的观点交流方面，我就已经不仅得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而且得益于日本学者和各个图书馆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思想研究方面，由于竹内实主持的十卷本《毛泽东集》的编辑工作，日本人的作用大大增加。无论如何，非常之多的材料在中国本土之外很难得到，如果不是这套既包含公开版本又收入内部版本的资料自1978年以来